

试论回商文化及其时代意义

回族商业的传统与时代复兴

论回商的经营之道

明清时期河州穆斯林商帮兴起初探

当代蕃坊：现状与未来

回商在义乌

回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

历史与现实：变迁中的回商文化

宁夏人民出版社

第一辑

杨怀中◎主编



中国回商文化



ZHONGGUO HUISHANG WENHUA
第一辑
杨怀中◎主编

中国回商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回商文化·第一辑 /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7-04219-8

I. 中… II. 杨… III. 回族—商业史—中国—文集
IV. F7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6971 号

中国回商文化(第一辑)

杨怀中 主编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周淑芸

封面设计 石 磊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0

字 数 700 千

印 数 14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19-8/F·31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主任 崔 波

副主任 王儒贵 张进海

委员 杨怀中 梁积裕 张少明 王克善 陈志文
马 平 马宗保 马金宝 丁克家 孙俊萍

主编 杨怀中

副主编 马 平 丁克家

编 辑 王伏平 金 贵 马 燕 马 敏

代序

9月的银川，是收获的时节。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谨代表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向莅临首届中国（宁夏）回商大会、中国穆斯林企业家（银川）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以回商的名义召开大会，据我们了解，在全国尚属首次。中国穆斯林企业家峰会也是首次在银川举办。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们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企业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回商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活动群体，既面临着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利用回商大会和穆斯林企业家峰会这个平台，广大回族企业家、经济界人士共同探讨回商精神，研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无论对回商自身的成长，还是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积极意义。

银川作为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有一支很大的回商队伍。近年来，银川市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无论是政府，还是回族企业家，都具有与全国乃至世界的回商和穆斯林企业家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强烈愿望。为此，今年年初，我们自己首先成立了回商联谊会。希望借这次大会，促进银川的回商与各地的回商和穆斯林企业家加强交往，寻求合作，扩大影响，提升自我。同时，也为银川开辟一个新的对外开放渠道。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办好这件事情。

回商是以民族界定的经济活动群体，与具有较强地域性特征的徽商、晋商等有明显不同。回商的个性很鲜明，除了民族性外，更重要的体现在回商独特的精神层面上。回商精神既丰富，又复杂，主要来源于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回商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育和融合，可以从多方面总结、诠释，我认为用“乐商坚韧，义利互济”两句话给予概括，比较符合其个性特点。

“乐商”是回商精神的显著特点。回商的“乐商”精神，主要来源于回族重商、崇商的价值观，以及善于经商的传统。伊斯兰教确立了一整套商业道德规范，把商业这一世俗的行为置于神圣的信仰之上。这在《古兰经》及“圣训”中有大量的反映。穆斯林们认为商业是“真主”最喜爱的产业之一，把经商看做是对“真主”虔诚的表达，称之为“寻

求真主的恩惠”。因而，回商把经商看做是一种事业和追求，而不仅仅是谋生赚钱的手段，这已深深积淀于其民族性格当中。这里所说的“商”，是相对于“农”而言的，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第二、第三产业，或者说是企业及企业化经营，不是简单的“买卖”或贸易。回商这种“乐商”的特殊品格，与儒家“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坚韧”是回商精神的重要体现。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回商的足迹更是遍布祖国各地。与其他商业群体相比较，回商有着适应性更强的特点，更能积极地融入周围环境，这靠的不仅仅是信仰，更是回商那种甘冒风险、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坚韧”品质。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队到云贵高原的马帮，从塞外边疆到中原大地以至沿海港口，都能看到一代代回商艰苦创业、勇往直前、永不停滞的“坚韧”的身影。这种“坚韧”，也反映出了广大回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义利互济”是回商精神的本质属性。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总体上是倾向于“重义轻利”的，这主要以儒家为代表。《论语》中讲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为君子所不齿，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两世吉庆”是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今世”与“后世”兼顾、物质与精神结合、义与利互济，既要求穆斯林立足现实、珍惜岁月、奋勇进取、建功立业，又要求人们以“今世”生活中的处处善行来换取“来世”的乐园生活，教人既追求功利，又承担道义，从而使义利相通、协调互用、互济互补。作为具有民族性的回商，显然深受“两世吉庆”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义利互济的精神融入到回商精神之中。当然，义利互济也蕴含了儒家文化中“以德经商”“经世致用”“济人利世”的优良传统。这也说明了回商精神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今天，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回商所独有的“乐商坚韧，义利互济”的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银川的实际看，近些年来全市的创业活动日益活跃，特别是广大回商执著打拼、积极进取，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总体上说，我们的创业文化氛围还不够浓厚，小富即满、随遇而安、怕担风险等观念意识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同时，有些企业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缺乏诚信意识，不顾环境污染、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等等。这些都是与回商精神相背离的。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弘扬回商精神，有利于培育人们的创业观念、激发人们的创业激情，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利于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也有利于广大回商做强做大。

近两年来，银川大力挖掘回族音乐、舞蹈、饮食、服饰、茶艺等文化资源，努力做好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精心创作出以大型回族舞剧《月上贺兰》为代表的一大批回族艺术精品，在打造城市特色中着力体现回族文化元素。但是，回族文化特别是作为其

重要内容的回商精神,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还充满了一定的神秘感,不为大家所了解。为了让这朵奇葩更加艳丽,使回族的文化形象更加鲜明,我们愿与全国的回族企业家及经济界人士一起,展现和弘扬回商精神,不断培育新时代的回商群体。

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的发展条件相对较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是一方创业的热土。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着力打造“包容、诚信、自强、创新”的城市品格和“雄浑贺兰、多彩银川”的城市形象,全力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历史最好时期,特别是在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之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更为推动宁夏及银川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都为包括回商在内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来银川投资置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我们真诚地欢迎八方来客到银川发展,尤其欢迎全国的回商和穆斯林企业家来银川发展。银川的回商也要走出去,与各地的回商和穆斯林企业家加强交流,增进沟通,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我们希望这次大会只是一个起点,这样的活动以后能定期举办,每次确定一个主题,也希望各地都能成立回商联谊会,加强回商之间平时的联系与沟通,在条件成熟后,能够成立全国性的回商联谊会,大家共做回商文章,打造回商品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银川愿意为此做些工作,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最后,祝首届中国(宁夏)回商大会、中国穆斯林企业家(银川)峰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银川度过美好时光!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崔波同志在首届中国(宁夏)
回商大会、中国穆斯林企业家(银川)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目 录

重振回商精神	杨怀中(001)
试论回商文化及其时代意义	丁克家(006)
关于回商文化的哲学思考	孙俊萍(013)
回商、回商文化与回族文化	李兴华(024)
回商伦理思想及其他	马 平(029)
论回商的经营之道	马广德(036)
历史与现实:变迁中的回商文化	薛正昌(047)
当代回商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沙鹏程 萧希洵(051)
回商企业集群发展的思考	冯 瑜 虎恩德(064)
回商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贾保平(073)
回族商业的传统与时代复兴	
——走向世界市场的回商	杨文笔(081)
云南回商的特点和经营理念	王子华 王 剑(090)
临潭回商(洮商)及其精神评述	敏文杰(099)
八坊民俗文化中商业文化特征及其建构	马东平(112)
略论回商的时代新发展	
——以宁夏“阿语翻译及商务代理”为例	金忠杰(121)
当代回商的文化自觉	
——以三营的回族商人为例	马晓琴(129)
云南回族经济三十年	马 经(134)
广西回族经济发展概述	王 莉 翁乾麟(158)
青海回族、撒拉族经济发展再透析	冶福龙(166)
甘肃临夏回族传统经济兴衰的思考	高占福(174)

- 河南怀川两大回族典型经济述略 李华英 拜存星 买胜利(182)
 当代蕃坊:现状与未来 王宇洁(191)
 回商在义乌 马春贞(198)

从“清真”到“HALAL”:

- 谈中国回族“清真食品”的本土化与产业国际化 李德宽(205)
 宁夏清真食品产业现状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马 晴 海天相(214)
 关于回族特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若干问题 马 平 马 敏(231)

- 回商与徽商的异同及当代启示 漱晓婧 米寿江(238)
 回商文化与晋商文化之比较 马 燕(248)
 回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 李 仁(258)
 回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

- 1833—1954年包头皮毛行业案例分析 袁紂卫 王正儒(267)
 近现代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

- 兼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马宗保(285)

- 明清时期青海回族与新兴商业城镇的兴起 喇秉德 勉卫忠(294)
 明清时期河州穆斯林商帮兴起初探 何 威(301)
 清末民初西宁回族商业的发展及其城市变迁 勉卫忠(311)
 近代西北回族商人的没落与重新崛起 杨志娟(319)
 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 钟银梅(335)
 河州历史上的回族运输商帮 王 平(345)
 从商业看云南穆斯林的历史:一点省思 马雪峰(359)
 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

- 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
 (日)吉松久美子撰 涂华忠译 姚继德审校(369)
 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特征与文化贡献 葛 壮(388)

- “识宝回回”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创新 王 平(402)
 “识宝回回”与中国珠宝业的发展 马建春(419)
 宁夏回族地毯经济概述 刘 伟(437)
 回商蒲寿庚的历史功过 魏德新(446)
 咸同年间大理回商巨贾马名魁 马颖生(464)

大理回族工商资本的代表:炳兴祥商号	马志宏(469)
民国时期吴忠回商及商号	王伏平(473)
伊斯兰教法对临潭回族经济的影响	丁士仁(482)
伊斯兰教的代治理念与回族人的重商精神及其实践	马志峰 丁俊(490)
汉文译著家对伊斯兰经济问题的阐述	金贵(499)
穆斯林商业道德的特点和作用	马惠兰(505)
托茂家的伊斯兰信仰及其经济生产	杨德亮(510)
当代西北清真寺和道堂经济的运行机制	杨桂萍(519)
社会网视角下的西北清真寺经济	王帆(533)
西北城市清真寺经济结构浅析	
——以兰州市清真寺为例	王希隆 喇延真 王平(540)
甘肃宣化冈道堂的商业经济(1889—1949)	马景(552)
回族穆斯林在拱北尔曼里的商业活动	
——以宁夏洪岗子拱北为例	高桥健太郎(561)
金帐汗国——中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	Э. С. 库利平 - 古拜杜林 赵晓佳译(570)
中五回族的商业活动	拉·乌·尤素波夫 丁一成译(578)
中五回族居住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伊斯马佐瓦·吉利巴尔等 丁一成译(584)
伊斯兰经济商业活动的资金运作理论与实践	巴基洛夫·拉希德等 丁一成译(589)
伊斯兰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马赫穆德·穆萨·拉希德等 丁一成译(596)
伊斯兰银行的功能和特点	巴基洛夫·拉希德 马赫穆特·拉希德 丁一成译(602)
首届回商文化论坛综述	洮桦(611)
附录	
《古兰经》中对经济商贸的有关规定	马敏(620)

重振回商精神

宁夏社会科学院 杨怀中

回回民族是中国境外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与中国境内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及其先民与中国的国际贸易紧密联系，他们对中国中古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回族的萌芽、形成、发展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条件。

一、唐代回商的国际贸易

唐代的阿拉伯贡使、商人们经陆上丝绸之路到达长安，长安城内贾胡蕃客多达4千余户。胡人之多，“薰街充斥”，唐朝特置互市监，掌理国际贸易事务，征收关税。唐代长安城内有“西市”，阿拉伯聚集于此。

唐代广州是对外贸易大港，可从广州直达波斯湾，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任命“市舶使”，管理国际贸易。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船舶“种类极多”“不知其数”“大舶参天”“万舶争先”，一派兴旺景象。“夷人随商翱翔城市”“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这是对广州国际贸易的生动写照。广州城内有阿拉伯人居住的“蕃坊”，蕃坊内有“蕃长司”，蕃长司内设有“蕃长”，管理蕃坊内社会事务和国际贸易。广州蕃坊最盛时有阿拉伯人13万人之多。阿拉伯商人帮助朝廷修建了广州城，同时修建了怀圣寺和光塔。

唐代互市港中，贸易最盛，阿拉伯人最多者，首推广州，其次为扬州。扬州在唐代，商业之兴旺冠天下。因其地处要冲，居长江与运河之交叉点，实为南北之枢纽，为北上开封、长安必经之地，故阿拉伯商人经常活动于此。泉州为福建海外出入之门户，唐中叶以后阿拉伯人来泉州通商。

五代时广州出现了“蛮裔商贾”，他们是出生在广州的阿拉伯人后裔，他们将中国

丝绸、瓷器、茶叶,运往他们祖辈生存的阿拉伯、非洲,再把当地犀象、香料、珍宝输入到中国来。他们出去都用一个“附名”,即中国的某某,也即中国的阿布都人、中国的哈散等。

二、宋代回商的国际贸易

宋代广州港继续繁荣,这时在广州的阿拉伯代表人物有:

番禺蒲姓 这是一位侨居占城的阿拉伯商人,后由占城来到广州。岳珂《桯史》有详细记载。

蒲亚里 这是一位在广州娶妻落户的阿拉伯商人,他以大宗货物和广州市舶司的交易,引起皇帝重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稍宽民力尔。”市舶司奉皇上之命,劝诱亚里归国,往来干运蕃货。

辛押陀罗 他是阿拉伯勿巡国进奉使,居广州数十年,家资数百万缗。他提出助修广州城。他在招徕穆斯林商人方面作出了贡献。

宋廷南迁临安,泉州远离金宋战场,故成为南宋重要的海上门户。阿拉伯商人竞相云集泉州。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那时泉州有“回半城”“半蒲街”的说法,诗人咏泉州有“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之词。《泉州府志·城池》云:“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南宋时泉州市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一跃而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当时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以万计”。泉州港的繁荣,给朝廷带来了巨额的关税收入。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泉州、广州两舶司的收入,增至两百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宋孝宗初年,泉州依靠穆斯林商人资助,造了宋朝政府摊派的战船。嘉定四年(1121年),泉州地方官员邹应龙以阿拉伯商人之资,请于朝而大修泉州城,城始固。宋代,泉州阿拉伯商人中有影响的人物有:

蒲霞辛可 这是一位落户占城的阿拉伯商人,以占城进奉判官的名义入贡,宋廷封给“保顺郎将”的官衔。

施那伟 《诸蕃志》说:“有蕃商曰施那伟,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息,作从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

蒲罗辛 来泉州贸易的大食商人。自“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广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宋朝政府给予“承信郎”的官衔,“赐公服屨笏”,嘱其回国时“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

佛莲 这时宋元之际的大商人,“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

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至元三十年，1293年）殂，女少无子，官没其资，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

蒲寿庚 宋元之际人，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豪富甲两广。泉州《蒲氏家谱》称先祖“家居西极”，“世秉清真教”，透露了他的阿拉伯血统。广州《蒲氏家谱》谓其入粤始祖蒲玛咈呵于宋代“自西域入中国”，并记蒲玛咈呵的三儿子蒲玛哈嘆、四儿子蒲哈珠“倡筑羊塔，俾昼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蒲寿庚的父亲开宗“特捐钜金，赞成甚力”。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寿庚因平海寇有功，提举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30年。旋升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集海外贸易及当地军政大权于一身。

三、元代回商的国际贸易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蒲寿庚弃宋降元，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子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市舶提举；次子师武，为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蒲寿庚降元，使泉州港避免了一次战争的破坏，保持了繁荣，使其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港。蒲寿庚于降元第二年即开港，招谕外商来港贸易。他们来自也门、哈姆丹、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姆、布哈拉、花剌子模、霍拉桑、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吉兰尼等地。

蒲寿庚以南宋泉州市舶管理模式指导元代市舶管理制度。元代的《市舶则法》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周密的一部外贸法规。蒲寿庚父子对元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从市舶司的建立到具体运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唐宋以来中国蓬勃开展的国际贸易事业发展到元朝出现了鼎盛局面。继蒲寿庚之后，担任市舶提举的回人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刺沙、哈散、倒刺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刺、忽都鲁沙等10人，他们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为适应国际贸易的财务计算需要，元代设立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讲授与回回有关的亦思替非文字。

唐宋元时期，回回民族及其先民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有晋商、徽商之称，我们可以把唐宋元时期从事国际贸易的回回民族及其先民参加中国国际贸易者称之为回商。

回回民族及其先民中从事中国国际贸易者，对唐宋元时期市舶司的建立与扩大、市舶制度的完善、海外客商的招徕，作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元时期进一步延伸，繁忙畅通，这与回商的国际贸易活跃有关系。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著《蒲寿庚考》一书称：“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半阿拔斯王朝奠都缚达以后，阿拉伯人由海上与中国通商，彼时盖经营不遗余力之秋也。”这些话是正确的，但从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看，唐宋元时期在中国执国际贸易之牛耳者，当是回回民族及其先民。

蒲寿庚在泉州法石一地有货船 400 艘，每艘载重量约 100 吨，400 艘货船总吨位为 4 万吨。拉开历史大幕，当这 400 艘货船在广阔的海面上迎风航行时，我们不禁想到明代回回人郑和率领两百艘大船，载 27000 人七下西洋的壮观景象，这不正是宋元时期蒲寿庚海船航行的继承和发扬吗？历史的锁链就这样紧紧地相扣着。

四、明清以来的回族商业

明清以来，丝绸之路关闭，回回民族以农为本，但仍重视商业。南方和北方各大城市回民多专营珠宝行业，时有“识宝回回”的赞语，更有“回回善营利”的普遍说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序中，将商业视为末业，而明代反封建的回族思想家李贽明确地反对这种说法，在中国历史上他又是一个为商业辩护的学者。李贽的祖辈从事国际贸易，祖辈以下多从事国内城市商业，因此李贽对商业和商人有较多的了解，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视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这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书》卷 2，《又与焦弱侯》）

明代回族商人活跃，可能在各地遇到种种刁难，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天方至圣实录》卷 20 收有永乐三年所以碑记：“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思哈智赴内府宣谕，当日于奉天门奉圣旨：每户赏钞五十锭，绵布二百尺足。与回回每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建，不许阻滞，与他住处。凭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这道圣旨内容是保护回族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对回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北方回民有的从事农业地区和牧业地区的物资交流，他们将农业地区的茶、粮、布、丝绸运往牧业区，又将牧区的马匹、皮毛运回农业区。茶马交易在这一时期回族商业占有重要地位，山陕商及回商专其利。回民向多兴贩私茶，潜由此路赴宁夏，沿途售卖，名曰茶家。咸阳木士元是一大茶商，是茶商户的“通行领袖人物”，他从湖北收购茶叶，运往甘肃、新疆。马生彦为陕甘茶商。清代西安近郊米家崖回民青年长年结伙前往甘肃、蒙古地方收购马匹，赶出潼关出售。至今西安回民中保存有《马经》，总结

各地马匹的性能、特长、形状及差异,这是明清时期回族人民从事茶马交易的经验记录。回民因经商而致富,陕西省西安市:“省城节署左右前后以此一带,教门烟户数成万(千)家,几居城之半。教堂经楼高矗云天,气势雄壮。绅富三分之一,乐业安居,自成风俗。”(《秦陇回务纪略》卷一)俄罗斯人记载说,东干人(回族人)善于艰苦跋涉,任何时候、任何山川,都阻挡不了东干商帮前进的脚步。只有突然到来的山洪,可以暂时使他们停步,只要山洪一过,他们的商帮越过山谷又继续前进了。

云南省回民从事滇缅通商,如腾越县“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善营商业。嘉道间,最称富庶,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腾越杜乱纪实》)。当时进入缅甸的云南商人,差不多全是腾越的回民,从缅甸输出的是棉花,从云南输入的包括丝、茶和各种手工艺品等。每年借互市贸易输入云南的棉花达300万磅~400万磅之间。贸易采取一种互市的方式。地址在瓦城以北13英里处。当时旧城已有一万滇商安家寄居。咸同以下,直至民国时期,云南回民仍以马帮通往缅甸贸易,不只是腾越一地。云南各地回民先后都组织马帮赴缅甸贸易,一派繁荣景象。另方面,在滇缅通商道路上,不时看到白骨累累,这正是回族商人为滇缅通商付出的惨重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江应梁教授在《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一文中提出的:

沙甸全村90余户人家,几乎家家都经营着副业——种蔗,榨糖,牛马运输,行商走贩,边疆垦殖。不过,这些事业何以其他农村的人民不去做,独让沙甸人去做?何以旁人走不好而沙甸人做来却很有成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忽略下面的几个因素。

1. 沙甸村人经营这类事业成功在于性格上具备以下条件:能吃苦耐劳,勇敢,冒险性强;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强,没有依赖家庭的习惯。这种性格,多少是由于宗教性格养成的。

2. 沙甸在地理位置上,占了一个适合于经营这些事业的优越条件。

3. 村寨长期的安定,使人民的生活能正常发展。

4. 在事业上不因循守旧,能够适应生活的需要。例如当粮食的栽种利益微少,他们会想法改种甘蔗;个旧矿厂需要什么,他们便能相应地去供应。

除第二项外,其他三项大概都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假如沙甸不是一个回教农村,也许便不会形成沙甸今日特征。

性坚忍,耐劳动,乐于经商,这历经千余年形成了回回民族一种潜在的发展的文化基因。

试论回商文化及其时代意义

宁夏社会科学院 丁克家

回商是回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参与和贡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回族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具开拓、拼搏创业精神的商贸经济实践群体。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们的商业经济活动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不同的文化传统形塑铸造了不同族群的社会活动总和。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经济活动的基础,也离不开作为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的文化传统。

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西方世界自16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和盛行,特别是其对人作为活动主体,要在世俗世界中讲究诚信、守约、俭朴、禁欲等伦理主张和实践,对人为“追求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代主张,对以欧美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建筑都产生了深远而悠久的历史影响,成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得以繁荣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之一,特别是对传统的宗教文化资源与人类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阐释和论证,成为人们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精神文化的一种独到路径。韦伯对后人最大的启发是,要重视在诸如市场经济、商业契约、工业文明发展背后“无形的手”的巨大作用,也就是不同文明传统对社会的塑造作用与持久影响力,这也正如儒家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印度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大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伊斯兰文明对阿拉伯世界与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多方面影响等,都是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不同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

回商是指回族中专门从事商贸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群,回商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

一个具有丰富社会经济文化内涵的跨地域文化概念。从历史到现实,回商作为回族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最活跃的群体,历来受到经济学界、民族史学界的关注,而且近二十多年来,对回商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资料积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相比,对回商的总体性研究、对回商分门别类的经验研究却明显不足,对回商的田野调查研究更显薄弱。特别是回商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实践中的时代性转型,缺乏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这与回族在“经济”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主战场的经济进步和追赶先进的发展愿望及实践不太相称,与回族社会经济文化总体的发展水平也不太相称。回商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谓姗姗来迟,回商的社会经济、商贸活动在中华大地已经有 1300 多年的实践历程。对回商的研究、再认识和经验总结分析,事关回族经济活动和实践能够正常、健康、有序地发展的前途,也是我们当下理解、认识和挖掘回商的经营理念、经营智慧、创业精神、时代风貌,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推进回族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与时俱进地全面提升经济竞争实力和发展动力,从而为国家、社会、民族和地方的发展贡献出更出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

正如世界范围内,数以千计的著作在集中研究和探讨“犹太人”的商业经营秘诀和成功之道一样,近 10 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商业界、文化界掀起了研究、分析、再现“晋商”“徽商”“浙商”等地方性的商业群体的历史、文化与营商智慧的热潮,而且通过多层次、多渠道,以电视媒体、网络等为多媒介,进行了诸如《乔家大院》等为代表的广泛而深入地推介与宣传。使这些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的经济贸易主体揭开了尘封的历史,走向前台,走向大众和社会主流。对地方性商人群体的研究,也从一个方面突显了近 30 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人们对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高度认同。从主流经济到社会大众,人们的商品意识、经营理念、治家理财观念普遍空前提高,经济观念日益从被动到自觉。这些时代巨变的潮流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及其不同利益群体之中。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55 个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与影响,一些民族中与时俱进的经济商贸意识和发展观念,培育出了在市场经济诸多领域崭露头角的一批批弄潮儿,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回族中的经济商贸及其经营群体,近 30 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中,回商也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焕发出勃勃的时代生机。